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十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七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张玉芳　刘炎臣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5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81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201-00239-4/K·48
定　价：　3.10元

China

目　录

铁衣曾照古中原……李汉魂（1）
——抗日战争回忆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宋则久的实业活动……宋美云（39）
宋则久轶事……宋廷璋　刘炎臣（45）
李景林勒索宋则久始末……宋廷璋　刘炎臣（61）
天津国货售品所《总务部公布留底》摘录……（66）

八十自述……吴云心（124）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袁　静（144）
我的创作生涯……何　迟（156）
笔耕生活漫录……阿　凤（185）

天津“鼓漫东姚家”轶事……姚惜云（201）
天津解放前乡祠卞家述路……卞迟叟（243）

China

质疑 订正·补充

对《回忆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一文的补正……王敬琦(257)

·小资料·

文信书局小记……王寿岩 (65)
卞氏小学之创办……卞学诣(155)
师恩难忘……慕凌飞(184)
戴愚盦轶事……李默生(203)

China

铁衣曾照古中原

——抗日战争回忆之一

李汉魂

一、是不喜欢战争，不是害怕战争

国家养兵，当然是意味着打仗，但兵凶战危，这是古今中外所共同认为属于人类的惨剧。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打仗不单是交绥部队两造的拼搏，“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鏖兮生死决”，仅仅是古代战争在疆场上接触时的片面刻画。其实在点、线、面以至发展到立体、发展到今日太空上，其残酷的程度已经证明逐步升级，因面其影响所及，其牵涉的的范围：就不纯属于“宝刀白刃”、“两军生死”，还包括战场内外、政略、军略战术、人力和事物的配合。据此可以估计到人的直接或间接的伤亡，物的损耗和毁灭，一个地区和多个地区糜烂所引起的惨状与必不可免的后遗，即如生产停顿、疾病蔓延、自然环境的改变、生态均

---

* 李汉魂先生生前，应我们的敦请，为之撰述北伐及抗日亲历的几个战役的回忆。北伐部分《我是沙场过客》，已经在本刊第38辑到第41辑发表。抗日部分《铁衣曾照古中原》，李先生写就尚未寄出，遽尔逝世，后蒙李夫人吴菊芳女士将该遗稿寄来，特分两次发表，并向李夫人致以谢意。

——编者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衡的破坏等等，都是战争的罪恶，战争的昏庸不可饶恕！

有人问：你反对战争吗？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不喜欢战争，尤其是反对穷兵黩武者发动的不义的战争！但我是军人，我不喜欢战争，并反对不义的战争，却绝不是害怕战争。而且，也抱着要化解可能引起的战争，清弥酝酿着的战争，制止行将发生的战争，扑灭已经燃起的战争。达成这些目的，我作为革命军人，觉得我自来就从事于研究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

从兵法的研究上，政略的运用在于遏止战争之萌，不让出现产生战争的机会，排除战争的因素；军略的部署则在于当不可避免的双方对峙中，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这一环则仍在于斗智，不得已而以战争消灭战争，以战争压倒战争。尤其是面对不义战争，敌人以侵略加诸于我，甚至以战争来威胁于我，我虽然不喜欢战争，也同时具有不怕战争的勇气。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也不让别人向我侵犯。我以兵凶战危为诫，到了各种手段的选择都不能避免战争时，本于军人守土有责，捍卫祖国义不容辞，我不但对我自己岗位寸步不移，我还自动请缨，以军人的本分去和敌人拼个死活！

另外，军人也应该有服从的精神，在认同了一种正义的主张，我是把服从作为天职的。我几十年的戎马生活，曾经在战斗的活动中受指挥，也曾经负责过大小不同的战斗活动。当我受指挥执行战斗任务时，我服从我的指挥者；当我指挥一个战役时，我也同样要求指挥者服从于我，军人的原则大抵如此。至于保卫人民、爱护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也就是在战争面临不可避免时，尽量使兵凶战危所加于人民的干扰减轻到最低限度。

China

二、回击了磨刀霍霍的"友善"与"和平"

——驻汕时期坚守民族立场

我自参加1924至1927年的北伐革命战争，一直隶属第四军，在第四军军中的生活和经历多次的有名战斗，都考验了我的不怕战争的精神和意志。为了人民的宁谧生活我不喜欢战争，为了人民前景的幸福和美满，我又本能地不怕战争了。北伐军北定中原以后，我在第四军所辖部队中挑了二十五师师长的担子。国事沧桑，形势变易，部队在多次整编中又换了番号。1932年我也脱离了第四军而回到广东，任独立第三师师长兼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驻韶关；1935年又改任广东的第三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驻潮汕。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公署是粤东军政的最高机关，也是国家（当时以陈济棠为首的所谓"西南政务委员会"掌握了两广党政军大权，处在"半脱离中央"的状态之下）派驻在汕头的最高代表。潮汕地区是我国海防的前线，也是广东东面的门户，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寇图谋以各种手段侵略我国的野心日见嚣张。1936年初，曾经有日人在汕头市街头倒毙事件，又有一华人在汕头台湾医院求治中，因针注时不治身亡。中、日关系常常由于这些敏感的问题而闹出轩然大波，日方竟然派来三艘军舰游弋于汕头海面，甚至在岩石湾泊，卸下炮衣，声言将派兵登陆；而日第二舰队司令及村中将和荻州参谋长更先后穿梭拜访绥署及汕头市府，用"中日亲善"的假面具，大肆贩卖一些侵略性的货色。根据当时可靠的情报：日寇企图以威胁、利诱、挑拨、分化诸种阴谋，策划一个类似满洲"爱新觉罗·溥仪"或者冀东"殷汝耕"模式的把戏，置我神州大地，我中华民族于刀俎

China

之上，任其奴役，任其烹割。情报还透露：日寇派遣了井运动汉奸直接参加这个可耻的行动。荻州、及村及以后陆续有海军将领木昌福、细萱等穿梭汕头，其实或明或暗的策动，都有迹可寻是他们在积极部署，甚或可以说就是他们负责的。日舰三艘违反国际法原则在我领海游弋，卸掉炮衣，意味着战备状态的升级，继之是中将级的负责人物向绥署拜访。我在 1936 年初也奉国民政府明令升授陆军中将，这可能只是一种对等原则的“舞台表演”，世间哪有一面磨刀霍霍，一面陪着笑脸侈谈其“友善”与“和平”？这种滑稽剧我是看穿了的，绥署和市府的每一个人看穿了的，潮汕地区的部队同人是看穿了的！国家信赖我，派我负责这一地区的民政和军务，我就本守土有责、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以至他（她）们的和平生活，义不容辞地执行职权。日寇头子每次穿梭往来，我首先表示只接受官式的拜会，其次我明确我是军人兼管地区民政，军人的意义与在一个国家里的作用，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有所共识。因此我也必定坚决地为我所担负的军政两方面的责任奋斗，我绝不会在这原则上后退。为此我表示了地区性的治安、社会秩序、内部的人为纠纷我会秉公处理，或报请军事、民政的上级机关处理；但如果牵涉到国际的问题、外交的问题，那就并非我的责任范围和职权范围。我这一立场，潮汕地区的军民显然给予我百分之百的支持，国家就是我和全体地区军民的后盾。

事态的发展，已经使南中国半边天笼罩了乌云，继日舰三艘炫耀汕市海面之外，又多开来了两艘，闽南和粤东的局势可说是因为被日寇如此胡为而骤然震撼了。我们当时没有海军（有的只是逾龄的、吨位极小、装备极原始的老式舰艇，几乎不堪出海，甚至连巡防内河也不甚顶事。有一艘大概叫做“宁

China

海”舰的也是向日本定造的，舰上一切对日寇根本没有“机密”可言，与其称这些为“海军”，不如干脆是没有海军），几千里绵长的海岸线长期暴露在别人的威胁之下，我怅惘地望着我负责守卫的海疆，深深痛惜于没有海军即没有海权，没有海权也无异没有国权。对于一个过去曾经在战场百炼的军人，一涉及到国权遭受侮辱，我的不喜欢战争马上转化成为不害怕战争了。我目睹万千军民面对日舰无视我们国家民族尊严激发起的敌忾同仇的义愤，也深深相信万一有朝一日厉兵秣马，我挥戈向前，万千军民将会把潮汕地区的领海“煮”得沸腾，让敌人的舰队葬在这火海之中！

除了及村和荻州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在真正侵华的战争中成为魁首之一的松井石根大将，他也经汕头赴广州对当时的“西南”当局访问。在他拜会胡汉民先生的时候，胡先生狠狠地给他一鼻子灰。当松井推销其“大东亚”什么鬼名堂时，恰恰就被胡先生依于孙中山先生国家、亚洲和国际的和平策略以及反侵略、反奴役的理论砸个正着。尤其是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下的日本外交系统，疯狂渲染“中、日、‘满洲’关系调整”、“共同反共”以支持其所谓“中日亲善”的滥调，胡先生一一剖析其与“中国独立自主主权的不容干预及神圣国土不容割裂”背道而驰。我们翻开历史，认识到硬骨头的人一到国家民族受到挑战，是懂得如何坚守其立场与保持其不亢不卑的崇高风范。

我现在回忆起那个外患危机四伏的汕头，绥署、市府和防军日夕聚精会神，严密注意日方的窥伺，人民群众亦莫不百倍警惕配合监视，所以潮汕地区，一直是可倚的长城，而于日寇则不啻是铜墙铁壁；我还回忆到那时有若干不明情况的人在曲解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一些艰苦周旋的折冲过程，把东区绥署说成是纵容或者掩护日方非法组织，这类的歪曲，当日有识之士，都莫不引为遗憾。

日人在汕市路毙的事件悬案半年未决，而日舰的倏忽来去，总使阴霾合而复散、散而复合。约到1936年6月底至7月初，日军西岗司令竟蛮横无理到口出限期，恫吓绥署，胁逼如事件不获解决，则7月20日即将以联合舰队开来粤海，登陆汕头。民族的尊严的蒙垢，又一次挑起了我以及所有机关部队的怒火！然而怎么办呢？7月2日，我只好向当日的“西南最高当局”陈伯南先生（作者注：陈济棠将军字伯南）急电请示，复电是：“请兄相机解决便是。”这寥寥八个字，该刺伤了多少人的心？该使当日的“南天王”自贬了多少威望？！

日本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南中国海域上日本海军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他们的小头头一再在汕头向我绥署登门威胁，我知道潮汕地区的人民以至各层级的军政领导单位是理直气壮的。我个人以地区最高负责者的身份，面对笑脸虎狼或咆哮野兽都绝无挫败感，人民赋予我力量，我怕什么呢？我向上级请示，在质朴的情怀中，只认为我应该顾全大局，顾全到战衅一开，也许就不是一个地区、一个省份遭受荼毒——我不敢估计到“全民抗战”究竟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才是临界的边缘——但看到外来无理的压力施加到头上来的时候，人民都几乎能够豁出了心交给我，虽是不喜欢战争的军人，却又怎会害怕战争而龟缩一隅？我曾经绕室徬徨，要怎样才能问心无愧？

三、正义感要我“封金挂印”

“汕头事件”和“八字电文”，给历史蒙上一层迷雾。与

China

此在历史上平行出现的是“西南揭橥抗日”和“两广事变”。

我本来在1936年初便因为要平息一些不中听的谣诼，向陈伯南先生请辞第六师师长及军区绥靖委员职务，但只奉准免第六师师长而擢任张达将军第二军的副军长，东区绥靖委员仍着兼任。我亦仰体陈伯南先生的德意，不再坚辞，这也因为我深受潮汕地区民气的感召。

跟日本人周旋是赴国难，但“西南揭橥抗日”所形成的局面是地方反抗中央，是引发一场国内的“箕豆相燃”，它和全国上下一心团结共御外侮的前提不能相容。“赴国难”我是甘心相从；“逞私欲”而发动私斗相戕，我则只能在力谏不遂后飘然引退。在同年的7月6日，我的确作了一件被人美誉为“封金挂印”的故事。在我离开东区绥署时发了一个通电，希望在局者能悬崖勒马，把抗日的决心，表现在巩固我东隅海防，然后以这样的实际行动促请中央采取全面抗战的决策。我看到要有全国统一的基础，政府和人民的全面动员，精神和物质的全面投入；还需要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甚至需要向敌人宣传，促进其国内反对不义战争的觉醒，这样我才可以谈抗日，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获得胜利。要不然，空言抗日，于事无补，倘若更被真正的外敌乘我之危，而我亦授人以隙，则千秋功罪，只系於一转念之间而已。我在电文中还说明了我将把东区绥署一应任务交付幕僚长暂时维持，库款一一封存不动。尤其是此次纯属个人良心血性的行为，与任何方面无关（作者自注：原电见附录）。

在国难日亟之际，我这一次举动，自然很容易引起广大爱国者的心声共鸣，中央及地方固不乏肝胆的有识之士，即陈伯南先生亦不失为一个铁中铮铮的人物，能挑得起亦能放得下，一

China

且审时度势，思想通了，他果真以开朗的姿态，交出权力，遂使金瓯无缺，避免了一次国家元气的斲损。至於他个人在广东方面的业绩，也能够使人有去后之思。人谁无过，迷途知返，到底仍然获得历史上公允的评价。

这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大转变，我们且不必缕述其过细的情节，也无须问此一枰棋中谁是高手，国人目睹阴霾豁朗之后的漫天花雨，地方割据的重归统一，初步瞻望到湔洗国仇，奋兵抗日的时期，已在不远。

四、军民一体，建筑祖国新的长城

两广还政中央以后，我奉命重领师干，仍旧统率原第六师的子弟兵，并接受中央新颁的一五五师番号，原第六师在我调任第二军副军长时已由接手的奉命移防北江。新番号下颁又命我再移防潮汕，我当然理解到这是因为我前此整军经武于粤省东陲，且亦曾面临日寇诸多要挟而未使国威受挫。师内上下，咸认为地理民情协洽，修我戈矛，磨砺以需，可以有地利人和之便，所以一五五师重驻潮汕地区，马上合力逐步进行应有的国防部署。

1936年冬，又有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结果在各方面的大力斡旋、团结忍让的调处下，国运再一次出现曙光，溯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我东北、扶植伪满洲傀儡，中间经历了六七年，日本军阀几乎每日每时在华北、华中、华南制造风风雨雨，不能鲸吞便施蚕食，不遂分化便逼胁逼，我神州大地上的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甚至荒村僻壤的百姓群众，都本于救亡图存的良知，发出了一浪高于一浪的爱国呼声并且见之于规模宏大的示威行动。我并不讳言

China

我们整个国家在战备上是需要积极组织力量的，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是属于国力的比赛。我们固然是地大物博，可是我们到底由于百年的积弱，帝国主义所加诸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使我们手脚都受桎梏。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经济不发达，甚至边远地区还处在蒙昧状态，许许多多的资源根本未被利用或者还在沉睡中；没有先进的军事装备，没有合理的国防建设，没有完整的军事指挥体系，这一系列的先天和后天不足。在当时全国动员真是谈何容易？但我个人长期寄身军旅，又长期以“清、慎、勤”策勉自己去深入基层，熟知了社会的风气，人民的意向，我确信如果把几亿人口的潜力尽致地发挥起来，那将是不可战胜的。而且人民意志的怒潮已经形成，士气可用。自古以来的哀师，也常常是可摧强敌，足以抵御暴力凭陵。潮汕地区的驻防，我一方面固然是竭尽愚诚，不遗余力地积极以固吾圉；同时我更十分珍视培养士气。物质之不足，以精神弥补之，让我们的国军部队和人民群众一道去缔建我们新的“长城”！

五、民心士气，可以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亚洲，也震撼了世界。

记得1936年7月6日我在汕头面临困境，又凛于民族大义诤谏无效面发出“鱼电”，我并非自比关云长，但“封金挂印”却是事实。7月7日、8日，广东局势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如果不提到“西安事变”的过程，则“七七”卢沟桥的枪炮声也仅仅是两广问题解决后勉强可以称为“统一政令”的一个周年。纵使这三百六十五日能够让我们天天磨砺以需，时时

China

刻刻准备应付东洋鬼子的强大军事挑衅，我们免不了先吃点落后的亏，那是理所当然。日寇肯定是不会乐于见到我们的统一，我全国走上真正统一之途，真正出现精诚团结，其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之忌也是理所当然。军国主义者日夕煽风布云，不外是阴谋挑动我们的内讧，给我们制造分裂，好达成其削弱和分化我国家民族的目的。从军事策略上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说良心话，答案是否定的；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一战了吗？答案也只能是等着瞧。但从我们忍辱负重的极限来看，从我国的民心与士气来看，我觉得可以一战，应该一战，而且是必须一战了！我确认，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都不喜欢战争，要是外来的敌人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的头上，中国人不是懦夫，中华民族也并不是甘心任人鱼肉、任人奴役的劣种，它，正如我个人所常常怀着的一种不移意念：不害怕战争！敌人不来，可以忍耐；敌人来了，就是要打！睡醒了的狮子的咆哮，敌人会领略它的滋味。

响彻了大地的抗战号声，也不管战火是烧过了卢沟桥，烧入了宛平，烧入了廊坊，烧入了丰台，烧入了我们伟大的北平古都，民族的义愤是敌人一下子估计不到的。北方战地的军民全都投入了这神圣的抗战，全国的军民全都投入了这神圣的抗战，从喜马拉雅山到东海之滨，从色楞格河到曾母暗沙，真正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那种忠贯日月、气壮河山的激昂情绪，虽事隔五十年，我仍然仿佛看到炎黄子孙慷慨悲歌的图景。那时我也正擐甲按剑，守卫在南海边缘潮汕地区的国防第一线上，旌旗猎猎，战马萧萧，健儿们与我同心，严阵以待地要为埋葬敌人掘备坟墓！我和潮汕的军民同立誓言：不怕战争并：迎接战争！

China

冯玉祥将军在抗战开始时是军委会副委员长，他在1927年北伐战争中曾和我第四军会师郑州、开封，他向我们伸出战友之手和胜利之手时高声说："同志们别称呼我总司令，叫我冯大个子就得！"当日他的豪情深深感染了我，他很欣赏我们广东的部队，赶着向华兄、琪翔兄、步云兄、育群兄和我叫小老弟，而且扇着他的毡帽式的军帽说："会当一日共同饮马白山黑水时，咱大个子再跟你们醉它三百杯！"这份豪情，一直成为我们几位生死袍泽的佳话。

当北平古都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一师师长赵登禹在奋战殉国后，冯玉祥将军曾写了一首《斥汉奸、颂良将》的古风体短诗，诗中说：

"……君不见，奋力为国拼性命，佟赵英名传五洲。汕头师长李汉魂，誓死不屈把土守。"

我并不骄矜于冯玉祥将军的赞誉，只觉得他当时以副统帅的身份寄予我以作为不害怕战争的军人的期许。冯老将军逝去许多年，抗战中我挥戈兰封，浴血南浔，以至后来防廉南粤，服务桑梓，冯老将军和我把晤时还老是喊："小老弟"，扯高嗓门地叫："看你又为百姓打跟亮仗啦！"音容宛在，历久难磨。

六、眼泪淹不没敌人，血可淹没敌人

战事由华北蔓延，1937年8月13日，日寇复发动华东侵略战，我国军第五军张治中部王敬久师和孙元良师首先奋起抵抗，是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开始。自此蒋介石先生即以全国最高总帅的名义连续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一书及第二书，郑重宣布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不能不还眼还牙，不图

China

苟俸，不惜牺牲，为保民命，为争国权，誓将抗战进行到底。他在文告里并指出了日寇企图亡我者，利在速战速决，而我抗战策略则唯有坚持持久战与消耗战以拖垮敌人。这种决策观点，在我以百年积弱，国脉如丝的总形势看来，是必然不可避免要走的一种迢长道路，而对将来出现的艰苦过程，也必定要有所估计。我没有什么对战略上的卓识，也谈不到盱衡什么全面的策略，仅是从我上面分析过的一些从地方、基层所获得的观感理解，知道站在国力竞赛的角度上，坚韧与持续是唯一取胜之道。质言之，这也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要敌人的双足自陷于泥沼，把敌人埋葬在我们浩瀚的人力汪洋大海之中。我告诫我辖属的部队，也就是遵依着统帅部所颁谕的精神，用一寸血来保卫我们的一寸河山，我们有足够的血来淹没敌人！

潮汕方面不管敌人的舰只如何耀武扬威，不管敌人的飞机怎样向我们肆虐，虽然我们的防务设施单薄，倘使敌人敢于进犯，他们必然要付出加倍的代价。我在负责范围以内，更注意加强了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赶修工事，弥补漏洞，成立各类型的组织以适应战时需要，即如地上防空系统、救护医疗系统、后勤运输系统、宣传教育系统、政治工作系统、调剂市场供应系统、稳定经济金融系统、组训民众系统、防奸谍报系统、妇女工作系统等等。所以自“七七”、“八一三”以来，潮汕地区包括各县市，一般民气昂扬，地方粗称安定。那时东区绥署已经撤销，按照归政中央后省县之间已重新划定区域，改设一个虚级的督察机构叫做专员公署，其辖区及职权都比当年的绥署为小。我只是驻军的负责人，我的精力也集中在对敌人动态的监视和对群众性抗敌活动的善诱利导。对敌的丝毫不退让，远在一年前与几个日军小头头“和平交手”时我便积累了经验，

China

它硬来我也使硬招；它笑里藏刀，我也绝不受糖衣毒药所惑。对善导群众抗敌活动方面，我着眼配合实际需要的节奏，珍惜他（她）们的热情，只要于抗战有利的，合理让群众发挥其天赋。我妻吴菊芳本来正在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就读，当她已自觉地以学生身份参加了访慰潮汕活动时，来到汕头便建议我一五五师组织部队眷属政治宣传和救护、自卫等队伍，当时我同意并迅速组织起来，纳入群众抗敌后援活动中。此项以军眷组成的组织出现在汕头地区，多少起了促成以后在各个抗战战场上建立妇女随军服务团、军眷服务团的作用，尤其部队政工，女同志成为一个有力的支柱。

守卫潮汕以来，我对潮汕地区国防工事的构筑缓慢和工程质量的未尽如人意，时时表示遗憾。虽然我在战争理论上早就认识到立体空间对战局已经赋予新的意义，敌人历次的空袭，其威慑力量是不能轻估的。无如我自己是陆军出身，所统率的也是陆军部队，对最现代的战争研究毕竟有局限，仍然不免在若干方面囿于平面空间的运动。即如法国马奇诺防线，在三十年代国际的军事思想还认为是最可依赖的长城，不过以后在陇海、南浔战场上的战争实践，以及纳粹德国以闪击战术横扫欧洲，法国一败涂地，马奇诺防线根本不曾发挥效用，我就理解到，平面的工事再坚强也必须有制空权才可以获得保证。三十年代的军事思想应该是介乎一种新旧实践的过渡，而且三十年代的中、晚期更一再飞跃，二十年代的军事思想已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了。

我们的确是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外，一切都居于劣势。然而当疯狂的日寇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不打行吗？我也并不是没有见过战争的人，戎马关山，根本就是沙场过客。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